

建德垂风 维城之基

——读罗泰教授《宗子维城》(下篇)

张良仁

作者虽然没有专门提出理论,但是人类学理论像地下水一样流淌于全书;其中氏族制度、列鼎制度、礼制重组、民族差别和周文化圈扩张,突破了过去的研究视野,改变了我们对于周代社会的认识。

本书纠正了一个流传几千年,历史文献灌输给我们的观念

由前述可知,作者挑战了许多传统看法,颠覆了许多传统观念。读者未必都会赞同作者的观点,但是读了本书之后自会获益匪浅。笔者以为,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提出了诸多新观点,而且在于提供了一些新视角和新方法,提出了一些新问题,值得读者关注。

古DNA研究。本书经常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每个墓地的墓主人的血缘关系。前文一再提到一个假说,即一个男性的墓主同属于一个氏族。这个假说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是有线索的,《周礼·春官》记载了专门掌管墓地的“冢人”。虢国墓地的材料似乎也支持这种假说。从上世纪五十到九十年代,这里一共发掘了252座墓葬。这些墓葬分为几组,每组以成对的大墓为中心分布了大小不一的墓葬,这些墓葬组由北向南排列。每组似乎代表一代人,而中心的大墓似乎代表族长和夫人。这一布局似乎在天马一曲村墓地得到了印证。但是这一假说一直没有得到证实。现在古DNA研究技术已经成熟,通过分析男性人骨的Y染色体,我们就可以梳理男性墓主之间的血缘关系。与此同时,关于女性,也存在另一个假说。本书提到,女性一般来自于外氏族。通过分析线粒体,建立数据库,我们可以发现其女性的来源。令人高兴的是,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已经开始行动,分析了新疆哈密地区泉儿沟等若干墓地的墓主人的基因,发现一部分人之间确实存在着血缘关系。

外语。本书研究的是汉学问题,但是引用了大量的日文、英文、德文和法文学术文献。作者自己很谦逊,称:“有些中文读者或许也会发现,熟悉一下西方以及日本学者的著作不无益处。”不过客观地说,学术发展到了今天,阅读外国考古文

献已经是一项基本功了。不读外国文献,就不知道外国汉学家做了什么工作,怎么思考,就不能掌握学术前沿。而在这方面,外国汉学家尽管人数不多,但是大多通晓多门语言,掌握中国、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学术成果,因此在学术研究上要优于我国学者。如前面提到的“礼制重构”,即是罗泰教授发现的。如果说我国老一辈学者还有资格嘲笑西方汉学家,因为当时有些汉学家欠缺汉语功底,那么现在我们恐怕没有什么优势了,要说有,就只有考古发掘权了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汉学家,功底深厚,在古文献(如《周礼》《春秋》《左传》)、古文字和考古方面接受了全面的训练,研究水平飞速提升。现在打开西方考古学著作,可以发现我国学者能够贡献的主要是发掘资料,而不是研究成果;即使是提供发掘资料,也不尽如人意,总是缺东少西。现在我们要培养中国考古学人才,还要仰仗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汉学家。归根结底,就是我们的研究生培养方式存在问题:一则过于专业化(古文字、考古和历史成为三个学科,相互分离);二则忽略外语,无法跟踪国际学界的前沿动态;三则缺乏人类学和考古学理论训练。我国考古学科要创世界一流,现有的研究生培养方式恐怕需要改变了。

历史文献。我国考古学的一个突出特征,就是带有浓厚的历史主义和金石学倾向。从过去的夏都(二里头)热到最近的尧都(陶寺)热就是其表现。一个学者要研究周代,就有诸子百家、金石文字和简牍文书可供利用。罗泰教授告诉我们,这些文字材料存在着各种问题,需要慎重对待,不能拿来就用。诸子百家为了说服统治者,在描述社会现实时往往夸大其词;金文和简牍文书为宗教文字,带有各种偏见。这些材料和考古材料一样,需要经过分析才能利用。可惜我国学者往往不仅拿来就用,而且迷信历史文献和铜器铭文,跟着它们走,而忘了考古学的独立性。作者

主张,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需要“分进”,也就是分别研究,然后“合击”,也就是整合两种资料开始研究。作者是这么想的,也是这么做的。实际上,本书还纠正了一个流传几千年,历史文献灌输给我们的观念,就是孔子眼中的“人民在秩序井然的等级社会里各安其位”的理想社会,并非形成于西周初期,而是西周晚期。

类型学。蒙特留斯(Gustav O. Montelius,1843—1921)的“类型学”从1930年引入中国以后,至今仍为考古学家广为使用。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,从五十到八十年代,“类型学”逐渐受到推崇,成了“中国考古学派”的一个标签。作者指出,虽然“类型学”行之有效,但是它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,而只是一个工匠的习惯而已。国家文物局颁布的新版《田野考古工作规程》(2008年)已开始纠正这种“类型学”崇拜,但是历史惯性仍然不小。而与此同时,我国学者在描述器物的形态特征时往往比较主观,不同报告的类型无法对照比较。实际上作者随手就抓到了一个批漏。在对照晋国北赵与天马一曲村墓地的陶鬲分期序列时,他发现北赵的陶鬲属于天马一曲村的两个类型,但是发掘者把北赵的两类陶鬲放在了一个分期序列中。不过,作者仍然利用了一些发掘报告的分期成果,但是用的是在经过碳十四年代和地层学验证了以后。

人类学。人类学在美国是个优势学科,分支繁多,有文化人类学、经济人类学、社会人类学和城市人类学,为考古学、历史学和艺术史研究源源不断地输入新鲜血液,同时又从上述学科得到滋养,彼此相长,持续发展。但是在我国,人类学极其薄弱,不仅人类学系少,而且教师少,培养的学生也少,因而对于我国考古和历史学界的贡献微乎其微。本书作者深受西方人类学熏陶,本书所用的“氏族”、“氏族”概念就是例子。氏族(lineage)实际上就是我们过去常用的宗族,氏族(clan)实际上就是我们过去常用的氏

族。氏族和氏族是西方人类学的老问题,研究成果较多,本书引用的Roger M. Keesing就是一位。但是作者没用宗族和氏族这两个我国学术界熟悉的术语,而选用了氏族和氏族,就是为了更好地陈述人类学的理念。氏族是能够追溯真实祖先的血缘集团,而氏族是能够追溯到一个虚构的祖先的“几十个甚至数百个”氏族。由于氏族可以吸纳没有血缘关系的氏族,所以它成了统治集团笼络同盟的一种手段。在本书中,二者成了打开周代社会的钥匙。这样姬姓(周)、姜姓(齐)和子姓(商)都是氏族,而不是过去认为的氏族。这样姬姓和子姓的差别是氏族之间的差别,而不是过去认为的商周民族之间的差别。氏族之间互相通婚,从而实现了文化融合,形成内部文化统一的“周文化圈”,从而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。

统计学。本书经常使用统计学来观察社会分化和男女差别,表明统计学是个强大的工具。可惜在我国考古学研究中,统计学一直没有得到重视,因此失去了研究一些重要问题的机会。也因为少了统计学这根弦,考古工作者在整理发掘报告时就不太注意资料的统计价值。因此迄今公布的大部分考古学材料,既不全面,也不具有统计需要的代表性。作者说,这个问题并非仅仅在中国才有,但是在中国这种问题格外严重。实际上,陈铁梅编写的《定量考古学》已于2005年出版,教材有了,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我国大学的考古学科普及这门课程,把统计学的理念和方法传授给学生。

人口。我国现在已经发现了不少东周时期的城址和村落,但是里面的居民一直无人关注。实际上,现已发现了不少大型墓地,可以用来研究人口问题。作者利用上马墓地的发掘资料做了精彩的分析。在这座墓地,只有19座儿童墓,占总数的1.8%,远远低于前现代社会50%以上的婴儿死亡率。这种情况表明,上马聚落的绝大多数夭折儿童没有埋入墓地。

同时,女性比例(与男性100:112)偏低,低于正常的100:96,因此少数女性没有进入墓地。这些没有进入墓地的人口埋到哪里去了呢?这也是人们不太关注的问题。作者推测他们埋在了聚落里,而这种墓葬容易为人忽略。发掘者将上马墓地分了九段,将墓葬分到各段以后,可以看到第二到第五猛增,之后持续减少。经过统计,这块区域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,人口数在250到350之间,如果算上儿童、底层女性和外来人口,还要翻上一倍;这样估算下来,上马村落的人口数量当在500—700之间。人口是社会学的一部分,也是一个富有潜力的研究领域。我们希望,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以后的工作中关注人口问题。

人类学理论像地下水一样流淌于全书

前面发表了一些个人感想。评论一本书,既要看到它的新见解,也要看到它的新启发。有关周代社会的论著不在少数,但是本书独辟蹊径,利用考古资料来研究周代社会,分析了一系列新问题,得出了一系列新看法,让人耳目一新。作者虽然没有专门提出理论,但是人类学理论像地下水一样流淌于全书,滋润着全书的各个章节;其中氏族制度、列鼎制度、礼制重组、民族差别和周文化圈扩张,突破了过去的研究视野,改变了我们对于周代社会的认识。除此之外,本书提到的古DNA研究、驾轻就熟的中文、日文和西文文献、统计学和人口学方法,为我国读者打开了窗户,拓宽了研究视野。因此,我国读者可以从此书受益的地方很多。其价值,或许可以借用《资治通鉴》魏明帝景初三年的一句话“建德垂风,维城之基”来形容。

(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;上篇见2019年6月14日《文汇学人》) ■